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余秋雨翰墨展》中，有一副我的自叙对联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联语为：“辞官独步九千日，挽得文词八百万。”

我这一生写的书确实不少。记得那个翰墨展除了展出书法外，还辟出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厅陈列我著作的各种版本，架势之大，确实有点惊人。

很多观众不相信这么多书居然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总是在长长的壁柜前反复查验、核对，最后找到我，说：“看来您日日夜夜都在与时间赛跑！”

我笑了，说：“我从来没有与时间赛跑，只是一直把时间拥抱。”“把时间拥抱？”他们不解。

我说：“时间确实很容易溜走，但我不参加任何社团、会议、应酬、研讨、闲聊，时间全在自己身上，那就用不着与它赛跑了。”

确实，我平生没有一本书、一篇文章，是受外力催逼而赶着时间写出来的。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是十分自在、从容的事。

当然，呼吸有时也会变得急促、沉重起来。例如在那么多书中，有两本就写得特别挂心，写着写着就会停下笔来，长叹一声，那就是《借我一生》和《门孔》。写《门孔》时，更会在长叹之后产生哽咽。

## 一

哽咽的声音很轻，但在写作中却是一件大事。

我这辈子承受的苦难太多，早已把人生看穿，绝不会轻易动情。但是，也会在一些安静的角落，蓦然发现大善大美，禁不住心头一颤。

心头一颤，能不能变成笔头一颤？文学艺术相信，心头的颤动有可能互相传递，轻声地哽咽有可能互相传递。即使是最隐秘、最难懂，也有可能互相传递。

眼下的例子就是本书第一篇，写谢晋导演的。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不必细说，但是一发表就有很多年迈的大艺术家带信给我，说他们经历了平生流泪最多的一次阅读。

而且，网上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的点击率之高，也大大出乎意料。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深处的人性通道，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堵塞。

这让我产生了某种乐观，于是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当作了全书的书名。不错，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门孔”，却是光亮所在，企盼所在，日月所在，永恒所在。

## 二

我用《门孔》写谢晋，其实并不仅仅写他个人，而且还写了一个事业，一段历史。

同样，当我写巴金、黄佐临、金庸、饶宗颐、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章培恒、陆谷孙的时候，也不仅仅写他们个人，而是写了一个个事业，一段段历史。

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我平日几乎不与外界应酬，却与那么多第一流的当代中华文化创建者们有如此贴心的交情。那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创建者们一起，熔炼成了一座最有温度的文化史。

对我而言，这个事实既让我感到光荣，又让我感到悲凉。光荣就不必说了，却又为什么悲凉呢？因为这些顶级创建者大多承受着无以言表的身心磨难。他们急切的呼喊，他们踉跄的脚步，他们孤独的心境，他们忧郁的目光，我都听到、看到、感受到了，因此我也就触摸到了当代中华文化的怆楚隐脉。唯有这种隐脉，才可能是主脉、基脉、大脉，而那些浮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浮脉、散脉、碎脉，甚至根本挨不到脉。

我在论述中国文脉时，对曾经被大肆夸张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作出了冷峻的宣判，认为它们不仅无法与古代文脉相提并论，而且也远远赶不上已经处于下行时期的明、清两代文学。相比之下，当代反而好得多，因为出现了这部书所写到的这些创建者，而且还有一个更庞大的创建群体，其中包括我的朋友莫言、贾平凹、余华、高行健、张贤亮、张炜、冯骥才、舒婷、杨东、张欣、陈逸飞、韩美林、吴为山、赵季平、谭盾、刘诗昆、余隆等等，更不必说本来就属于我专业范围的影、视、剧系统了。有趣的是，很多年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处于隐潜状态。即使在哪个社团挂了个名号，也绝不在媒体上折腾。这正契合了我的文化哲学：真正的文脉，总在热闹的背后。阵势豪华的媒体，大多在做相反的文章。

## 三

这部书，出版后曾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中国文脉》的当代续篇”。与《中国文脉》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一篇都出自我的记忆。

文学意义上的记忆，是一种生命互馈的深切体验。我在书中，不仅仅是一个视角，还包含着自我坦示。这样，对于我写到的朋友们，也有了一种“彼此交感”的诚恳。

因此，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我的娓娓自叙。其中谈到自己与笔墨的关系，与诽谤的关系，特别是与亲爱母亲的关系，篇幅都不短。全书最后，又回忆了我与妻子马兰的情感历程，成为隆重的压卷。这些内容，都是我来不及向书中的老友们细说的，相信他们即便已经在九天之上，也会侧耳细听。

写这些自叙的时候，我停笔的几率就更高了，很多段落几乎写不下去。直到隔了很长时间，心情稍有平复，又陆续写了《大隐》《安静之美》《寻找》《我也不知道》《刀笔的黄昏》等短文，作为补充，收录在《雨夜短文》一书中。

我深研佛教，当然明白“自己”不值一提。因此，所有这些自叙，都是借“自己”之名，描述了中华文化万般艰难。算起来，我为中国文化已经历了数万公里，已经写作了数百万字，已经讲演了半个地球，但它的前途将会如何？我以这些自叙表明：确实不知道。

我相信，我在书中写到的这些朋友，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心态也是同样的迷蒙苍茫。

张渊源：马小跳是一个十分丰满的艺术形象，我想他一定也有生活原型吧？

杨红樱：马小跳的原型是我当年的学生，确切地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几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调皮捣蛋，我当老师的时候很年轻，都被他们气哭过，但我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身上，各有一些我认为很可贵的品质，于是，我把这几个最具特质的孩子合在一个孩子身上写，一个个性十足、有着浓浓的孩子味儿的马小跳就在我笔下诞生了。

张渊源：马小跳对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杨红樱：马小跳一直是我想写的一个儿童形象，可以说，他是我的理想，我在他的身上，寄予了太多的东西：比如我的教育理想；我对当今教育现状的思考；我对童年的理解；这里面还包括我做老师、做母亲的人生体验。我笔下的马小跳是一个真正的孩子，我想通过这个真正的孩子，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童心世界。

张渊源：马小跳已成为中国孩子童年时期的精神伙伴，其影响力也已经从中国延至海外，你在写这个普通的孩子时，有曾想过马小跳会成为影响力这么大、这么深入人心的文学形象吗？

杨红樱：一部作品是不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个形象是不是能在读者心中立起来，这只能由读者的感受来决定。而儿童的阅读是最不带功利色彩的阅读，他们只相信他们内心的感受，只相信作品本身带给他们的感动，他们的阅读是最真诚的阅读。所以，作为一个童书作家，只需要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一颗平常心来写作就好了。

张渊源：您当老师是深受学生喜欢的老师，现在是中国孩子热爱的童书作家，您常说有一条通向孩子心灵的道路，您是怎么找到这条道路的？

杨红樱：有个词叫“同情心”，也可以理解为“同理心”。我一直抱着一颗同情心来面对孩子的成长，面对他们成长的烦恼，面对他们所犯下的错误。马小跳对秦老师说这么一句话：“您不要着急，我会慢慢长大的。”除了同情心，孩子们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用温暖慰藉着他们慢慢长大。

张渊源：您曾经说过您小时候，是个笨小孩，在《笨女孩安琪儿》这本书中，有您小时候的影子吗？

杨红樱：应该这么说，小时候的我，是两本书的生活原型：一本是《笨女孩安琪儿》，一本是《漂亮女孩夏林果》，我有点笨，但是长得很漂亮，这就是艺术加工的妙处：马小跳可以是几个男孩子的集合体，而小时候的我，也可以分解成两个女孩子。

张渊源：很难想象，像您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小时候居然是个笨小孩。

杨红樱：也许就是笨，成就了的今天。记得那时玩“点兵点将”的游戏，那些聪明的、能干的孩子都被点走了，剩下我，两边都不要，就让我给大家看守衣服。看守衣服的过程，我的眼睛会一直死死地盯着那堆衣服，就怕丢一件，别人都笑我“死心眼儿”。今天，我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应该得益于小时候的笨吧。

张渊源：除了认真，您的专注和坚持，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也是小时候的笨修来的美德吗？

杨红樱：可以这么说。聪明的孩子，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容易受到诱惑，一会儿干这样，一会儿干那样。像我这样的笨小孩，没有那么多的诱惑，可能就会盯着一件事情干到底。有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女孩子学用钩针钩桌布，这活儿很难也很花时间。还没钩到一半，她们都放弃了，又去学别的，干别的了，只有我还在那里钩。整整一个暑假，我就做这么一件事情，钩了一张很大的铺圆桌的桌布，以至于我们的爸妈都挺惊讶：这么精致的漂亮的桌布，居然出自我们的笨女儿之手。

张渊源：您从19岁发表第一篇作品到39岁出版了《女生日记》才成名，这漫长的20年，你写了上百篇的短篇童话，十几部长篇童话，但却默默无闻，这期间，你想过要放弃吗？

杨红樱：从来没有。因为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喜欢做的，与功名无关，我的爱，我的快乐都在这里。即使我至今还未成名，我也会为孩子写下去的，否则，我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

张渊源：熟悉您作品的人都知道，您最擅长写“淘气包”“坏小子”之类的男孩子，这些孩子在您笔下呼之欲出，个个生龙活虎，您为什么对这些孩子情有独钟呢？

杨红樱：像马小跳、张达、唐飞、毛超，这些都是最普通的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很值得写。这些普通的孩子最具孩子本色，能在他们身上挖掘出许多鲜活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比那些出类拔萃的神童更具魅力。

张渊源：他们是一群有童年的孩子，正如您在《五三班的坏小子》后记里写的那样，“他们该调皮的时候调皮了，该捣蛋的时候捣蛋了，爽快地过了一把孩子瘾”。童年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杨红樱：人生漫长，童年时期的人叫孩子，孩子的天性，表现在男孩子的身上，调皮淘气是难免的，应该是人生最难忘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可是我们现在好多孩子，因为学习的压力，被迫丧失了童年。人的一生只有一个童年，过去了就没了。有一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他们寝室里的男生都喜欢读马小跳的故事，他们从小学忙到中学，从中学忙到大学，进了大学才发现他们没有童年，只有从马小跳身上找回他们的童年。

张渊源：马小跳有五彩斑斓的童年，令人羡慕，同时令人羡慕的还有马小跳的友情，现实中的孩子很少有友情，您却不惜笔墨，写友情的内容占了整部作品相当大的篇幅，您特别看重童年的友情吗？

杨红樱：童年的友情，是最纯洁、完全没有功利色彩的情感。马小跳选择唐飞、张达、毛超做朋友，是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孩子，情投意合，气味相投，能玩到一起。长大后进入社会交际的朋友，多多少少会带一些功利色彩，这就是人的年龄越大，越是怀旧、越是怀念儿时的伙伴的原因。

张渊源：唐飞、张达、毛超是马小跳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你用在他们身上的笔墨，也是浓墨重彩的，让他们个性凸显，如今也成了孩子们心中的明星。只要他们几个在一起，您的文字就会飞扬起来，能说说个中奥妙吗？

杨红樱：他们四个之所以形影不离，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个性鲜明的人，性格中有太多的不一样，才能相互吸引，才能各显神通，才能取长补短。尽管他们有打打闹闹的时候，甚至还有背叛与遭遇背叛的时候，最终还是谁也离不开谁，不离不弃地在一起。所以，只要他们四个在做同一件事情，或者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四个不同的性格就会碰撞出许多精彩来。

张渊源：可能许多人会认为快乐是一种性格。在您的作品中，您似乎一直在强调：快乐是一种能力。

杨红樱：我一直认为“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个可

以面对一切的能力。我笔下的马小跳，还有《男生日记》中的吴缅，他们跟现实中的孩子一样，也有成长的烦恼，也有不被成人理解的委屈，还有种种的无奈，但是他们有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这就很了不起。成长过程的最佳状态是快乐。

张渊源：马小跳身上除了幽默感，也有责任感。您说过，您一边写马小跳的童年，一边想着他的未来，您设想马小跳长大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杨红樱：我喜欢马小跳，还真的喜欢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就拿《同桌冤家》这本书来说吧，他当野炊小组长，当纪律委员，包括他的同桌冤家路曼曼生病后他的所作所为，都能看出他身上敢作敢为、有担当的责任感。所以，马小跳长大了，一定是一个顶天立地、有情有义有担当的男子汉。

张渊源：正能量也是你作品的另一种魅力。您的作品被誉为“滋养孩子心灵成长的人格修养读本”，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但您的作品可读性也很强，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这里面的诀窍是什么？

杨红樱：童书写作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因为童书的读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在成长中，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需要在阅读中得到心灵成长的引领，所以，给他们的读物，教化功能是必须的，童书作家背负着使命感，但又不能给小读者讲大道理，只能把这些道理藏在那些好看的故事中。我有一个比喻，一个好的童书作家，就像一个厨艺高超的厨师，可以把营养丰富、但口感不好的粗粮，做成精美的点心。能够让儿童发自内心的喜欢、又能引

编者按：  
疫情期间，杨红樱笔下的儿童文学形象马小跳三次被推上微博热搜，一百多万的点击量，唤起了童年阅读的集体记忆。持续已久的“马小跳现象”又掀起一阵高潮。这部在中国已经出版近20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为什么热度不减？马小跳为什么能深入人心？

# 马小跳： 唤起童年阅读的集体记忆

□张渊源



领他们心灵健康成长的作品，其实是很难写的，这要求童书作家有别于成人作家的一种特殊功力，就是深入浅出。

张渊源：在以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很难读到正面描写小男孩小女孩之间两小无猜的情感，因为这个“度”太难把握了。但在您的作品中，除了“马小跳系列”，还有《男生日记》《女生日记》《假小子戴安》，这方面的内容都占去了大量的篇幅，而且您都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这个“度”也拿捏得非常好，您是怎么考虑的？

杨红樱：我们都经历过童年，童年时期的青梅竹马，是人的一生中最干净、最没有功利的情感，这种天真无邪的美好情感，最值得浓彩重墨去写的。

张渊源：尽管我们都有童年，都有童年时代难忘的往事，也明白那是一段美好的情感，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在读小学时喜欢异性同学，或是被异性同学喜欢，为什么还是会紧张，甚至感到可怕呢？

杨红樱：因为都习惯简单粗暴地得出一个“早恋”的结论。其实，小男孩小女孩之间的喜欢，包括喜欢的理由，都是匪夷所思的，没有路数的。大人们往往缺乏去了解的耐心，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而成人的想象往往带着世俗的杂念。实际上，是大人们世俗的杂念，把简单自然的事情带偏了，让小男孩小女孩纯洁的关系变得可怕的。

张渊源：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家长，甚至老师，不希望儿童在童书作品中有小男孩小女孩之间朦朦胧胧的情感的内容。

杨红樱：不写，不等于没有。其实，每个孩子小的时候，都会有他特别关注的异性，这是很自然的。我作品中写到这些，也是在对孩子进行爱情教育。这是一种生命现象，植物都有雌雄之分，它们只有在在一起，才能生长得好。无论是童年时期还是在青春期，都会有某一类男生吸引某一类女生，或者某一类女生吸引某一类男生，这是必然要发生的，我认为根本不需回避，只需告诉他们，这其实不是爱情，却是一生当中最没有功利、最干净的情感。

张渊源：您常常说，成人需要向孩子学习，您认为成人最应该向孩子学习什么？

杨红樱：真诚。就拿阅读来说，如果没有受到成人功利阅读的影响，孩子真心喜欢的读物，还是那种能够让他们内心感动的作品。只有深入到他们中间去，才能真正地听见他们内心的声音。因为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他们的真诚一直激励我：只有真诚的写作，才能收获真诚的阅读。

张渊源：您的作品，特别是“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以儿童的视角再现儿童的童年生活，体现了您的儿童观和“儿童本位”的创作观。

杨红樱：无论是做小学老师，还是后来做童书编辑，做童书作家，我一直在为儿童工作，儿童在我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一个小书迷说，翻开一本书，只要看上几行字，就知道是不是我写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读我的书，字里行间，好像有一条暗暗的通道，我能通到他们那儿，他们能通到我这儿。我理解这位小书迷说的“通道”，就是通

向孩子心灵的道路。

张渊源：“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刚出版时，赢得了孩子们的热捧，却遭到了不少老师和家长的抵触，这是为什么？

杨红樱：虽然他们是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但他们根本不了解孩子，也不愿意去了解孩子，连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也忘记了。他们不能欣赏马小跳身上的孩子天性，更不能宽容这么一个天真、活泼、有优点、有缺点的孩子，他们希望我写一个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孩子来做榜样。现在，随着我的作品的影响日益扩大，有很多老师和家长已经开始喜欢我的作品，他们说我的作品架起了成人和孩子沟通的桥梁。

张渊源：正是您这份单纯的坚持，才赢得了孩子单纯的心。那些已经长大的孩子在回忆他们的童年时，通常有三个关键词：杨红樱，马小跳，笑猫。

杨红樱：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全国各地的签售现场，常常有一些个子高高的大孩子也排在等候签名的长长队伍中，但他们并不签名，只是想对我说声“谢谢”，我的书陪伴他们度过了童年。在云南个旧，一个高二的女生交给我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珍藏着您的每一部作品。这些作品触动我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像马小跳那样的纯真率直的秉性，做真正的、不做作的孩子。我想，无论我在成长中将遭遇残酷的现实，人心的险恶，我的心都不会消极灰暗，我还是想在风雨过后向着太阳微笑，还是相信世界上还有能够带来春天的孩子们……献上我最衷心的祝福！在您的文字中，我学会充满希望地成长，做一个健康自信的我。

张渊源：您曾经说过，您最大的愿望是破解童心，这

个愿望，您实现了吗？  
杨红樱：我只能说我还努力中。当然，也有小读者来信鼓励我：“杨阿姨，我第一次读您的书，就被您温暖纯净的文字深深地吸引，深深地感动，因为很少有大人真正地去了解孩子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想干什么？而你想到了，也做到了，这不是因为您曾经做过老师吗？如果每一个老师都像您一样了解学生，我们的成长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您说，您最大的愿望是破解童心，阿姨，我可以告诉您，您的愿望实现了！”  
张渊源：您的作品“巧妙地融汇了西方近现代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先进理念”，在儿童教育观上，您受谁的影响最大？  
杨红樱：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思想家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了自然教育的原则：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  
张渊源：在您的作品中倡导“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受到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观点的影响。  
杨红樱：我在当老师的时候，他的一部著作《通向孩子心灵的道路》是我反反复复读的一本书，读书笔记都做了十几本，我还针对我班上48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建立了48份个性档案。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童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因此，必须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要重视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和丰富的道德情感，帮助儿童树立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高尚的道德理想。他主张通过各种特有的手段和途径对学生进行美的陶冶，“教会孩子能从周围世界的美中看到精神的高尚、善良、真挚，并以此为基础确定自身的美”，而这种美乃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力量源泉”。  
张渊源：“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共27本，从2003年出版到今天，这一路风风雨雨，有褒有贬。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套书创造了中国儿童阅读的奇迹，畅销10余年，行销6000多万册，马小跳作为中国当代儿童典型的艺术形象，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中国孩子童年时期的精神伙伴。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您对此部作品也有这样的期待吗？  
杨红樱：真正的经典，一定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有很多人来读，而且还能流传下去。相对发行量，我更在乎“马小跳”这套书，它到底能走多远？因为时间能证明一切。  
张渊源：我听很多孩子说，以前并不喜欢读书，是因为遇上了“马小跳”，而爱上了阅读。  
杨红樱：一个童书作家最大的收获，最幸福的收获，就是通过她的作品，让孩子爱上阅读，这也是一个童书作家最起码的责任。  
张渊源：在《女生日记》之前，您是一位写了20年童话的童话作家，写“淘气包马小跳系列”这种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对您来说不是一种挑战？  
杨红樱：在我三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这是我写的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有句俗话说“画鬼容易画狗难”，大家都没有见过鬼，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而狗是大家天天都能见到的，要画得让大家心服口服，太难！而儿童读者要在马小跳的画面上既能看见现实中的自己，又能看见理想中的自己，真是难上加难！  
张渊源：“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创作的时间长达20年，至今还在继续创作，让您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什么？  
杨红樱：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定力的人，我的信念就是时间。真金不怕火炼，好作品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都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是用时间炼出来的，不是贴标签标出来的。我只相信时间。时间在我心中是最公正的权威。  
如果时间把马小跳留下来了，证明马小跳这个艺术形象是成功的。